

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变迁

汪林茂

(浙江大学 历史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清代嘉道以后,浙江传统学术日趋衰微,无论是理学还是汉学,都在走向败落。与此同时,传统学术内部出现了一股世俗化、理性化的趋势,在学术内容、学术精神、学术方法等方面作好了迎接西学的准备。在此基础上,浙江学者们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中的优秀部分,吸纳西学,创立了近代学术。

【关键词】晚清; 浙江; 传统学术; 近代学术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 942X(2004)05- 0044- 10

晚清不仅是政治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文化大变革的时代。学术作为文化体系中生产知识和观念的部门,同样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除旧布新的大变革过程。换个角度说,晚清的学术变革和发展过程,是那个时代文化、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浙江无论是在清代还是民国时期,都可称得上是“人文渊薮”;无论是传统学术还是现代学术,都可谓先进。因而,本文试图以晚清浙江学术作为分析研究的个案,以更具体地描述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及文化大变革的过程。

一、传统学术的衰微

浙江号称“文物之邦”,学术研究历来发达。宋代以后,就有十多个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流派。清朝中期“如日中天”的朴学之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浙江学者如黄宗羲(余姚人,1610— 1695)、毛奇龄(萧山人,1623— 1716)、胡渭(德清人,1633— 1714)、万斯大(鄞县人,1633— 1683)以及万斯同(1638— 1702)等人的学术贡献。乾嘉时期,浙人从事经史研究者极一时之盛,尤其是全祖望(鄞县人,1705— 1755)、邵晋涵(余姚人,1743— 1796)、章学诚(上虞人,1738— 1801)等大师的史学研究成就,曾是灿烂辉煌的乾嘉学术之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汉学唱主角的传统学术兴盛局面,在浙江一直持续到道光朝(1821— 1850)初期。道光以后,从横向比较看,浙江依旧是传统学术人才及学术成就最突出的省份之一;但从纵向,即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浙江和全国一样,传统学术在这以后已日趋衰败。不仅乾嘉汉学被学人所唾弃,理学余焰也渐归寂灭。今文经学和再图复起的汉学也不得不向西学让位。传统学术从乾嘉时期的“门庭若市”,至光绪(1875— 1908)末即变成“门前冷落车马稀”。

关于这一由盛而衰的转变之所以发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以国学大师和亲身经历者的双重身份,指出了传统学术及各个学派在道光后衰微、裂变的“自身”原因和“环境变化”原因:其“自身”的原因是,汉学研究方法虽然精善,但研究范围却很狭隘。其成就最高的训诂一科,经几代大师发明略尽,所余者不过糟粕。但汉学家们仍聚讼纷纭于此,“则其为空也,与言心性者相去几何”?更重要的是道光以后的“环境变化”:嘉、道以后,社会危机日重,学者们咸“归咎于学非所用”。在学术领域唱主角的汉学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再加上清代汉学“发祥地及根据地”之一的浙江地区经太平天国运动冲击后,“文献荡然”^{[1](p.5)},经学研究领域转呈冷清局面。两次鸦片战争更使士人们突破轭蔽,“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日烈”。经学益趋衰败。

收稿日期: 2003- 04- 10

作者简介: 汪林茂(1949-),男,浙江开化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这个分析颇为深刻,也符合当时浙江传统学术变迁的实际。为了以事实加以证明,笔者对清代浙江学术名人人数作了统计,并整理成表,从中可以看出清代学术的兴衰和走向:

表 1 《清史列传》、《清史稿》的“儒林”、“文苑”中浙江学者人数变化表

学者出生年代	文苑人数	儒林人数		合 计
		汉学人数	理学人数	
1591—1620	19	5	8	32
1621—1650	34	11	6	51
1651—1680	19	7	6	32
1681—1710	30	6	3	39
1711—1740	18	14	0	32
1741—1770	18	24	1	43
1771—1800	18	12	5	35
1801—1830	5	6	4	15
1831—1860	1	3	1	5
1861—1900	0	0	0	0
统计人数	162	88	34	284

*资料来源:据徐吉军编《浙江历代名人录》(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中的有关资料统计并编制。

表中所谓“儒林”,即《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主要从事经学研究的人物传记;所谓“文苑”,则是文学之士的传记。但两书“文苑”所收传记中的有些学者,实际上主要是从事经史学术研究的,著名者如章学诚、施国祁、张作楠、钱仪吉、钱泰吉、沈、龚自珍、汪日桢,等等,也应归入传统学术研究者之列,所以这里将“文苑”人物也一并列入表格。

从上表从事经史研究的人数看,清代浙江传统学术领域曾出现过两个高潮:即出生于 1621—1680 年间的学者(从事学术活动的年代主要在康熙年间,1661— 1720 年间),和出生于 1741— 1800 年间的学者(从事学术活动主要在乾隆、嘉庆时期,1736—1820 年间)。这两个高潮,正与“康乾盛世”并行。而 1771 年以后出生、学术活动主要开展于鸦片战争前后的儒士则急剧减少。至 1848 年出生的“巍然为清三百年朴学之殿”的孙诒让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浙江人可以进儒林、文苑之列了。因此,上表各时期儒林、文苑人数的增减变化,实际上是画出了一条清代浙江从事传统学术研究的队伍由壮大、减少,渐至门可罗雀、后继无人,亦即传统学术由盛而衰,以至穷途末路的曲线。

同时,我们从上表清代浙江“儒林”中从事理学和汉学研究的人数增减变化中,还可看到浙江儒学各派别的盛衰历程:

第一,理学盛—衰—盛的马鞍型曲线。清初,由于清王朝的大力表彰,程、朱理学一时炙手可热,浙江的理学家人数也在康熙(1661— 1735)年间超过或逼近汉学,曾出现过陆陇其(平湖人,1630— 1692)、邵廷采(余姚人,1648— 1711)这样的著名理学家。但好景不长,理学独尊后表现出的霸道和拘迂守旧倾向,以及学术上的空疏无实,遭到越来越多士人的指责,理学迅速走向式微。至嘉、道之际,面对越来越沉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一些士人归咎于“世道人心”之败坏,社会风气“逾越范围”,由此对理学规范人心的“救世”作用有了更急迫的感受。于是在理学家曾国藩、唐鉴等人“救焚拯溺”的呼号声中,理学重新抬头。“儒林”中的浙江理学家也猛地出现了 5 人、4 人(见表 1)。他们中有借调和朱、陆以复兴理学的会稽人宗稷辰(1788— 1867);有致

力“居敬穷理”，“潜思力行”，“谨守绳墨”^{[2] (pp. 5412-5413)}的平湖人方(1792—1834)；有“兢兢于义利之辨”^{[2] (p. 5399)}的会稽人潘谔(?—1853)；有“学专三礼”，“笃守程朱”^{[3] (p. 1481)}的秀水人高均儒(1812—1869)；有“斤斤以宗法程朱为事”^{[3] (p. 1483)}的黄岩人王(1828—1899)等。而成就最为显著、且名闻当世的是仁和人邵懿辰(1810—1861)和义乌人朱一新(1846—1894)。邵懿辰是咸丰年间著名理学家，史称其“博览群经，研究义理”^{[2] (pp. 5219-5220)}。咸丰中因事罢官后，居家专心著书。著有《礼经通论》、《尚书通义》、《孝经通义》等。其中尤以《礼经通论》最为著名，曾国藩称赞此书“深思明辨”，“淹贯精深”^{[4] (p. 771)}。实际上，邵懿辰是力图通过复兴古代礼制来强化程朱的“天理”网罗。1861年，因其矢志忠于清王朝，被太平军所杀。朱一新则是继邵懿辰之后名闻光绪朝的著名理学家，人称其“嗜濂洛关闽之书”，“其学务通经以致用”^{[5] (p. 81)}。朱一新曾任御史，因上书劾及李莲英而遭懿旨诘责且降级，遂告归，被张之洞聘为广州广雅书院山长。为“辨章学术以端诸生之趋向”，他曾著《无邪堂答问》，反复阐明“自东海放乎西海，理之本诸大同者无弗同也”^{[4] (p. 434)}之义。当西学越来越大规模地流播中国、士人越来越倾向于新学之际，朱一新仍以一个理学家背时的执著，竭力要“辨明学术”，阻止青年一代士人的新“趋向”，实在是螳臂挡车，不识时务。邵懿辰、朱一新等人振兴“天理”的努力，只是濒死之理学回光返照而已。作为一个学术上多为主观臆说，哲学上唯心，政治上已属保守、反动的学派，已越来越没有它生存的天地。所以，自1894年朱一新去世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列入“儒林”的浙江籍理学家了。

第二，汉学(主要是古文经学)由盛而衰的坡型曲线。在乾隆、嘉庆时期，越来越多的士人因理学的学风霸道、学术上空谈性理而对其反感甚至厌弃，在这一时期兴起的由虚返实的学风引导下，学者们对汉学趋之若鹜，理学则到了几乎无人问津的境地。1711—1770年间出生的浙江学者中，汉学家与理学家的比例竟是38:1。谓汉学“如日中天”诚非虚誉。但汉学雄踞学坛的局面也没能持续多久。到了嘉、道之际，随着“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形势逼近，儒学格局为之一变。在众多“琐碎”、“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6] (p. 17)}之类的指责下，汉学也遭士人厌弃。虽然，与全国其他省相比，浙江的汉学家仍可称得上是才俊辈出，成果卓著，但从整个学术趋势看，汉学毕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向汉学讨生活者逐年减少。至同、光年间，俞樾(德清人，1821—1906)、黄以周(黄式三子，1828—1899)、孙诒让(瑞安人，1848—1908)三人以盖过当代经师的学术成就，让古老的汉学在浙江闪射了最后的光芒——俞樾之学以乾、嘉间的王念孙、王引之为宗，但也吸收了道光间常州学派的治经方法，以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治经之道”，著《群经平议》，为古代经籍校正误文，发明故训，解决了许多前人没能解决的难题。继而又著《诸子平议》，其成就尤引人注目，他对文辞深奥的先秦诸子之书作了精到的训释和考订，且多有精义阐发，为后人治诸子学奠定了学术基础。俞樾一生著作等身，后人称誉他为“同、光间蔚然为东南大师”^{[4] (p. 374)}。黄以周承其父黄式三之学，追孔门之“博文约礼”，毕生从事礼学研究，主张以礼范围政教，充实义理，所著《礼学通故》百卷，考释古代礼制甚详，学者称该书可与唐代杜佑《通典》相比^{[7] (p. 42)}。孙诒让可谓最后之朴学大家，他潜心经学三十余年，著书三十余种。梁启超评曰：“瑞安孙仲容(诒让)，治周礼，治墨子，治金文、契文，备极精核，遂为清末第一大师，结二百余年来考证古典学之局。”^{[8] (p. 74)}但已属古老而朽腐的汉学毕竟与近代精神相背离。光绪末，在迅疾奔腾的西学东传、社会变革大潮流面前，这位曾深究经学的大师也深知经学之无用。他深刻地反省道：“诒让章句腐儒……虽少治旧学，略窥一二，而刍狗已陈，屠龙无用，实不足以应时需。”^{[9] (p. 142)}传统意义的汉学正是在思想开通的孙诒让这里宣告终结。

二、传统学术中的世俗化、理性化趋势

实际上，经学中无论是理学还是汉学，早在嘉道年间即已破绽百出，它在传统学术中的地位受到了众多士人的质疑。但在当时社会，经学所拥有的知识资源、思想理论资源及其话语阐释体系之权威性仍无可替代。因而，有识之士还是只能在经学内部寻找出路，即从经学中寻找应付时需、支持变革的知识、理论及阐释话语体系。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通经致用”、“经世致用”。这种力图使古老经学“致用”于当下鲜活且变动不居的社会实际之努力，从根本上说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但这一努力的结果却起到了推动传统学术嬗蜕裂变，并向世俗化、理性化发展的作用。

这首先表现在传统经学营垒中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嘉、道年间，清王朝由盛而衰。一些思想更为敏锐、开放的浙江学者抛弃了保守且脱离社会实际的古文经学和理学，选择了今文经学以应世变。最早是嘉庆末年曾从外祖父段玉裁治朴学的龚自珍(仁和人，1792—1841)，响应现实社会的召唤，决意“烧尽虫鱼学”，转而治公羊学，且给公羊学的“微言大义”赋予社会批判的内容，给公羊学的“变易”观注入务实求变的内容；继而在道咸年间，仁和人谭献(1830—1901)也以公羊学作为自己的治学所向，《清

儒学案》编者称其“治经必求西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屑于章句”，“学有体用，又通知时事，于古今上下得失了如指掌”^{[4] (p. 400)}，对“三通统”、“张三世”之说多有论述；德清人戴望（1837—1873），则是在稍后的咸丰年间治公羊春秋之学，他很重视对《论语》中“仲尼微言”的阐发，“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10] (p. 727)}，以公羊手法著《论语注》，注重阐发《论语》中“素王”、“改制”之义，损益因革的“三统”说，以及“三世”渐进之旨。这种主张经义多元而拒绝成说、从现实而不从经典立论、重在宣究经书“微言”而搁置经典文本、重在释经而不是述经的经学，在学术上是摆脱经典羁绊而建设理性学术的开端，是摆脱经学思维而建立自由、独立学术的开端。

其次是汉学的学术蜕变。面对道光朝以后社会、民族危机急迫的现实，浙江的一些汉学家们也选择了学术经世的道路。他们舍弃汉学崇古、琐碎、脱离现实的学风，但继承了汉学中崇尚客观主义的学术和精神资源，并将其转化为联结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的桥梁。早在道、咸年间，在“坚船利炮”的催逼和东渐西学的催化下，一批出自朴学门户的“畴人”继承并发扬了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精神、怀疑求真精神以及实证方法、类比、分析、归纳方法等可与近代科学相接轨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方法，由原本主要从事对古老经典的考据、训诂，转向对客观世界的探索、研究；从原来依附于经学，为“穷天地”、“侔造化”，即为儒家信仰体系服务，转向主要研究那些可验证的知识，以认识客观世界。如乌程数学家陈杰（约卒于道光末），认为算法之用，“第一至要曰治历，次出师，次工程钱粮，次户口盐引，次堆积丈量。儒者所为则考据经传，商民则营运市廛交易，持家日用”。为此著《算法大成》，自加减乘除至平弧三角，皆列诸法，为图说，以利普及^{[10] (p. 738)}；余姚诸生黄炳卮（1815—1893），为浙东知名的通晓勾股、三角、开方之士。同治初奉命参与测绘沿海府县舆地图。此后又根据测绘实践，融会诸法，著《测地志要》，至中法战争时被中枢颁发各营，作为测绘用书。他们都力图使学术研究走出经学殿堂而贴近世俗社会。而著名“畴人”项名达（杭州人，1789—1850）对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的论述；戴煦（杭州人，1805—1860）对数表、三角函数表、三角函数对数表造法等成果；徐有壬（乌程人，1800—1860）对因月亮视差造成的时差、气差、刻差以及日食过程中各地见食时间计算方法的探讨，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问题的阐述；李善兰（1810—1882）的尖锥术理论的阐述、驰名中外的“李善兰恒等式”的提出、著名的“费尔马定理”的证明等，则使“畴人之学”日益疏离经学而独立，脱离“形而上之道”而开始自由研究，并将自然科学研究推到了近代大门。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最后一代汉学家，更是把汉学推向新生。朴学大师孙诒让后期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已呈现出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学术趋势——1893年，孙诒让撰成《墨子间诂》。此书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对《墨子》文本的校勘和训诂；还在于他运用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对《墨子》原著作了精确的考释；更在于他治墨子学的深意，即揭示《墨子》一书中“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按：今译亚里士多德）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这类中国学术近代化所需的哲学“精理”和“微言大例”^{[9] (p. 87)}，表现出近代学术思想的萌芽。1902年，孙诒让的《周礼政要》问世。此书尝试运用古文经为当代政治变革服务。全书采用类比的方法，先录一段《周礼》原文，次作注解，再引欧美各国的有关制度、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新政策相比附，说明“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当之伦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之旧政已发其端”^{[9] (p. 363)}。虽是牵强附会，但这种治经方法及其所表达的内容、思想倾向，都表现出与经学相反的近代精神。至光、宣年间，曾入汉学门户的章炳麟（余杭人，1868—1936），也同样继承和发扬了朴学中可与近代学术相接轨的科学研究精神和方法，把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扩大成一门学问——诸子学，而将历来定于一尊的儒家拉下庙堂，置于与诸子学平起平坐的纯然的学术门类的位置。可以说，这是中国学术摆脱经学道统，建立独立、自由、科学的近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表现。

以这两个学派为代表，晚清整个学术界都出现了一股学术世俗化的趋势。即学术内容由训释经典、阐发义理向从事国计民生之实学转换。而从学术力图冲破唯伦理主义的束缚，追求面向客观世界的自由研究这一角度说，又表现出学术理性化的趋势。不只是今文经学派的龚自珍主张学术应讨论“弊何以救，废何以修，穷何以革”的国家现实政治变革问题；戴望治学辄留心于当代兵农礼乐诸务、民生利病，甚至政治问题；即使是理学家宗稷辰也很留心“当世之务”，于河工、钱法、兵防等方面多有建言；古文经学派的黄式三，也“于当世之务筹之甚熟，作《兵事十策》，歆觐于海上之事”^{[11] (p. 151)}（注：所谓“海上之事”即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且，有志经世的学者们不仅提出思想主张，更将其形成经世之作。其范围广泛涉及到有关国家安危盛衰和民众生计优劣的水利、荒政、盐法、财政、币制、吏治、朝政、边防、海防，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在这股学术趋势面前，经学的主旨已被湮没，其主导作用已被搁置，体系也已被割裂。学术由此而渐渐告别经学，迎接东来的西学。

三、近代学术的创立和发展

传统学术的世俗化、理性化趋势,无意中为迎接西学和学术转型作好了准备。鸦片战争后,由于船炮枪械落后于人的现实和战败的屈辱,使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于士人面前。在此推动下,浙江传统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研究趋热,从事“畴人之学”的士人进一步增加。见下表:

表 2 清代浙江畴人人数变化表

学术活动时代	畴人人数	学术活动时代	畴人人数
顺治—雍正间	19	道光—同治间	40
乾隆—嘉庆间	27	光绪朝以后	30

*资料来源:据孙延钊连载于《浙江通志馆馆刊》第二、第三、第四期(民国 34 年,1946)的《浙江畴人别记》有关资料统计并编制。

道光至同治(1821—1874)期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数之多,大大超过了传统学术鼎盛的乾嘉时期,说明自道光朝以后,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士人在不断增加,自然科学在学术中的地位日渐上升。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传统的“畴人之学”正在向近代科学演进的趋势。前面列举的著名“畴人”项名达、戴煦、徐有壬、李善兰等所取得的成果就是证明。

而比量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 19 世纪 50 年代后浙江科学家们翻译和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工作,直接将中国科学推入近代。

鸦片战争后,浙江士人、尤其是那些科学家们,立即以其特有的敏锐从这场战争中看到中西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并迅速作出反应。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戴煦三兄戴熙时任广东学政,第一次看到英国的“汽船”(轮船)后,立即写信给戴煦作介绍,曰:“吾弟精思,必得其制”。此后戴煦即对英国的“汽船”进行了研究,并凭借自己已有的知识,“由水、火、土、气四元行入手,著《船机图说》”^{[12](p.1507)}。而李善兰则以科学家的敏锐眼光进一步从西方人的“器”精看到了“学”的先进性和重要性:“呜呼!今欧罗巴诸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而要消除这个差距,就必须‘人人习算,制器日精。’”^{[14](p.260)}这里所说的“算学”,显然代表着整个自然科学,亦即主张由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而达到“制器日精”。可以说这是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论在浙江的发展。

对西方先进科学的清醒认识,推动浙江科学家们投入到引进和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的活动之中来。其中贡献最突出的仍是李善兰。1852 年,李善兰来到上海,自此便开始了与外国传教士合作翻译外国科技书籍的工作。他不懂外语,因此便由外国传教士照本口述,由李善兰执笔撰写,翻译了 6 种科技书籍。而这 6 种科技书籍在整个中国近代科技史上都具有开创之功:1858 年,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后 9 卷,使欧几里得的数学名著《几何原理》第一次有了完整的中文译本;同一年,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共同翻译《重学》20 卷刊行,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经典力学理论体系,并第一次完整地向中国人介绍了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同年,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艾约瑟合译的《植物学》刊印问世,书中介绍了在西方创立不久的细胞学说、植物体各器官生理功能的理论、以及近代植物分类学说;1859 年,李善兰再度与伟烈亚力合作翻译《代数学》,这是中国第一部符号代数学译著;同年,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作的另一部译著《代微积拾级》刊行,是为中国第一部介绍微积分学的译著;同年,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印行,首次把哥白尼开创、后经开普勒发展、牛顿完成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系统地传播给中国人。李善兰的这些创造性工作,为中国科学从传统向近代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归安秀才张福僊也在译介西方科学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最著名的是 19 世纪 50 年代译成的《光论》,这是中国第一部光学译著;临海人周郁雨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的《电学纲目》于 1879 年刊行,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经典电磁学译著;若论译书的数量,应推慈溪人舒高第、海盐人郑昌为最,分别达 20 种、16 种,涉及理、医、农、兵、工、政各领域。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这些浙江早期科学家、学者们辛勤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创建和发展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

从表 2 看,光绪以后浙江“畴人”人数在减少。但这并非浙江自然科学研究走向衰落,相反,这正是清末浙江传统“畴人之学”

向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表现——光绪末期以后,在“畴人”减少的同时,越来越多受过近代高等理工科教育的浙江知识分子开始投入近代科学研究,见下表:

表 3 1861—1895 年出生的浙江近代著名学者分类统计表

教授	文史哲学家	科学家、工程师	医学家	经济学、法学家	教育家	艺术家	作家	记者、编辑
36 人	36 人	18 人	27 人	9 人	17 人	69 人	9 人	15 人

*资料来源:据徐吉军编《浙江历代名人录》中的有关资料统计。

因为从 19 世纪末开始,浙江就不断有官派或自费留学生出国学习。自 20 世纪初年后,已陆续有留学生毕业回国。从 1907—1911 年的 5 年间,毕业回国留学生获得格致、数理、化学、工、农、医各科进士和举人功名的,分别有 18 人和 35 人^[13]。当然,实际毕业回国的理工科留学生肯定超过这个数字,因为有不少留学生并没有去争取,或者没有考取这种“中体西用”的功名。

这些回国留学生除了少数从政以外,多数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和研究工作。由于他们接受过正规、系统的理工科教育和学术训练,使他们对自然科学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系统的掌握。因此,他们的学术研究活动更多的是从科学发展本身的规律和要求出发,以向客观世界求知为目的,通过实证研究而取得成果。如曾在江南水师学堂、矿务铁路学堂以及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较全面地学习了自然科学的周树人——后来成为伟大文学家的鲁迅,从 1903 年即开始发表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如《说》、《中国地质略论》(1903 年)、《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1907 年),以及论著《中国矿产志》(1906 年)等。1910 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学科学学习的湖州人章鸿钊,回国调查了杭州府境内的地质、地层构造和岩浆岩,返校后撰写了题为《中国杭州邻区地质》的毕业论文,成为第一位撰写中国区域地质论文的人。章氏在 1911 年毕业回国后,获格致科进士衔,入京师大学堂的农科大学讲授地质学,这是中国地质学者走上大学讲台的开端。在化学方面,德清人俞同奎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得化学硕士学位,是最早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之一,还与其中国同学一起组建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回国后担任京师大学堂理科教授、化学研究所主任。在物理学方面,1904 年,慈溪人何育杰被京师大学堂派往英国学习物理,1907 年,在曼彻斯特大学获物理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物理学硕士。何氏于 1909 年回国后,又获得格致科进士衔,任京师大学堂格致科教习,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的第一批拓荒者。此外,还有一些留学生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学术论文发表。如在浙江留学生创办的《浙江潮》(第 4、5、7、10 期)上署名壮夫的《地人学》,研究的是地理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何时的《气体说》(载《浙江潮》第 4 期),论述了气体的性质、各种气体“物质结合之分子”的不同,气体在各种压力、温度下的变化,以及气体动力学原理等;黄孙的《植物与人生之关系》(载《浙江潮》第 9 期),探讨了各科栽培植物与森林(野生)植物对人类物质生活的不同效益,植物对人类涵养德性,陶融感情的作用,以及植物与人类文化发展关系等;知白的《水力说》,以力学原理对水力资源及其利用价值进行了探讨;《说合金》(无署名,载《浙江潮》第 10 期)一文,论述了合金的定义、合金的制成、合金的物理性质等。这些论文若与当时西方的科学研究水平相比是很肤浅的,但在中国及浙江,的确是近代自然科学创立、学术研究活动开始的表现。

我们从表 1 看,文苑、儒林中已没有 1860 年以后出生的浙江人。这同样也不能看作是学术活动在浙江的中断,而是传统学术没落、近代人文与社会科学在浙江产生的表现。因为正是在 19 世纪末,传统的儒林、文苑队伍急剧减少以至消失的同时,学术领域先后涌现出以闻名全国的张元济(海盐人,1867—1959)、夏曾佑(钱塘人,1863—1924)、章炳麟、王国维(海宁人,1877—1927)、蔡元培、陈黻宸(瑞安人,1859—1917)等为带头人的一批新型学术大师和研究者,浙江学坛依旧是人才济济(见表 3)。

这批浙江、也可以说是全国的近代学术精英都曾受过传统学术的训练,至 19 世纪末又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熏染,并接受了西方学术中的价值观念和科学方法。他们继承了旧学前辈关注学术、重视民族文化建设的精神,以及朴学中的严谨学风、实证主义、善于归纳等治学方法;而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则引导他们对传统经学进行了清理和批判,明白地宣告:“今日之时代,已进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14](p.71)}。公开批评汉武帝以后的学术专制,指出孔子并不是什么“圣人”,乃“古良史也”^{[15](p.179)},即一般的史学家。也批评了对儒家经典的盲目尊崇,指出六经的“经”并无“经天纬地”之义,“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16]。并且否定“六经以外无学”的定论和学术格局,呼唤学术的“独立之价值”^{[14](p.71)}。

如果说学术脱离经学束缚而独立是近代社会科学在浙江产生的第一个条件的话,那么,自觉地采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则是近代社会科学产生的第二个条件。西学日益大规模输入,使得晚清浙江这一代学者看到了西学中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科学方法。他们认为要发展中国的学术,就要学习和引进西人的治学方法。“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17](p.366)],并开始自觉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例如:

——“精于分类”是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学术研究,已完全打破旧的经、史、子、集体系,也不再有所谓宋学、汉学、中学、西学之分,而是以切合学科内容、性质的哲学、伦理学、名学(逻辑学)、美学、史学、教育学、律例学(法律学)、文字学等名目作科学的分类。

——他们既发扬了朴学中“无征不信”的传统,更吸收了西方近代科学研究中所倡导的归纳、分析、比较和实验的科学方法,提倡“精研覃思,钩发沈伏,字字征实,不踏空言”的“实事求是之学”^[18]。其中王国维开始实践的“二重证据法”,即他后来归纳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17](p.2)],更是运用这种科学方法的典范。

——他们也很注重从西学中吸取演绎方法,主张学术研究应在归纳之后加以概括,由具体而达于抽象。如王国维在《红楼梦》研究中,就批评旧“红学”往往“以考证之眼”评《红楼梦》,主张学术研究应注重“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19](p.19)]。

正是在抛弃经学研究方式,批判地继承传统学术方法,接受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浙江有识之士努力建设中国的近代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美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等门类,试例举如下:

哲学:浙江近代哲学思想,是19世纪80年代后在陈虬、宋恕、汤寿潜、章炳麟、王国维等人不断深化、探索下发展的。而最早将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作原理概念体系介绍的,是那些留学国外的学生们。1903年5月,署名“公猛”者在《浙江潮》第4期上刊登了《西腊古代哲学史概论》一文,首次给哲学下了明确而通俗的定义。他说:“哲学二字,译西语之Philosophy而成,自语学上言之,则爱贤智之义也。”哲学即“以相当之法研究包举宇宙与根本智识之原理之学也”。继而在《浙江潮》第8期上刊登的师孔的《哲学纲领》指出,哲学的学科范围即:纯正哲学、论理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的目的“在明事物之真理,讲思想之规则,探万学之大源,得论理、心理、伦理诸学之原则,而穷研之,明证之”;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包括:世界有涯无涯、灵魂之为生为灭、天神之为有有无、时间空间之属心界属物界、万物之由心造由物造等。由是,哲学学科开始建立。

法律学:在中国近代法律学研究方面,归安人沈家本(1840—1913)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沈家本曾任职刑部数十年,对清朝律例及历代法律制度有很深的了解。甲午战后又开始研究西法、西律,在比较中西法律制度的优劣后,产生了“中西会通”、“取人之长、补吾之短”的思想。同时也认识到中国的法制既要“征之今”,又须“考之古”,推崇“西法”而不弃“中法”。因此,他倾全力对中国历代律例作了全面清理和深入研究,撰写出《历代刑法考》21种78卷。对从唐虞至明代的律例各门类进行了具体的探讨。1902年,沈家本兼任修订法律大臣,主持修律。为借鉴外国法律,他组织人员翻译了各国法典以及法学著作。而且对每部外国法典、法学著作都逐字逐句,反复研究,务得其解。正是在博取中外、深入研究的学术活动基础上,沈家本形成了以法制取代礼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道主义和司法独立的法律思想。他还主持修订出《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等新法典。沈家本的法律学研究和法制改革实践,是中国近代法律学产生的一个标志。

社会学:社会学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新兴学科。浙江学者一开始即参与了这门新学科的创立。继严复译《天演论》介绍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学说后,1898年,章炳麟与曾广铨合作,翻译《斯宾塞尔文集》,连载于《昌言报》的第8、第16册上,这是国内最早翻译的、较系统的斯宾塞著作。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章炳麟接受了西方社会学。1902年,章炳麟将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译成中文,并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发行,这是中国第一本全文翻译出版的近代社会学著作,是中国近代社会学创立的一个标志。

语言文字学: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语言文字改革的要求。平阳人宋恕、瑞安人陈虬、桐乡人劳乃宣等先后都提出了采用并推广“切音文字”、“简字”——汉语注音字母的建议和方案,以帮助民众识字并学习文化知识。但从学术上阐述语言文字改革理论、实践上也有创获的则是章炳麟。在1904年修订完成的《书·订文》中,章炳麟站在历史的高度,论述了语言文字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同书《方言》一文中,又提出了中国语言统一的问题。此后又相继著有《中国文字略说》、《转注假借说》、《小学略说》、《二十三部音准》、《小学答问》、《文始》、《新方言》等学术著作,探讨了转注、假借与汉语发展的问题,汉字形体、故训与音韵三者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汉字形体、语音、字义的发展,方言问题,等等,揭示了汉语发展演变的历史及其规律,为中国近代语言文字建设奠定了学术基础。1908年,章炳麟撰写《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反对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废除汉字、汉语,改用“万国新语”(世界语)说,主张将“使易能易知”作为文字改革的方向。建议利用传统的草书改造汉字,使汉字笔画由繁趋简;创制简便的“反语记注字旁”,即使用注音符号帮助识字、阅读的方法。而且,当时章炳麟已创制出一个注音符号的方案——由36个“纽文”(声母)和22个“韵文”(韵母)组成,并建议将这58个字母用于蒙童教育。1913年,教育部召开的“读音统一会”,不仅接受了章炳麟的语言文字改革理论,也把他所创制的58个纽文、韵文作为制订全国统一的注音字母的基础。

史学:史学在浙江历来发达。至19世纪末,新史学在中国兴起,其中的大家多为浙江籍学者,如章炳麟、夏曾佑、陈黻宸等,他们为建设近代史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史学的指导思想上,他们主张以国民中心史观取代传统的帝王中心史观。1902年,陈黻宸发表《独史》一文,主张仿照“泰西史例”,撰写以“民义”为中心的史学著作^{[20] (pp. 562-563)}。在史学方法上,章炳麟在1902年即主张史学更应注重从史实中“熔冶哲理”,“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15] (pp. 167-168)},即运用新理论分析和叙述历史。在史学体例上,他们都力图打破传统的正史体系,建设新史学体例。章炳麟主张创建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典志为一体的体例。他据此拟定的《中国通史略例》目录计5表、12典、10纪、25别录,共100卷^{[21] (pp. 162-163)}。陈黻宸所拟定的《中国历史纲目》,上自五帝,下迄当代,分成8表、10录、12列传^{[20] (pp. 569-575)},彻底打破了旧史学的王朝体系,将历史写成一部全面的社会发展史。而第一个依新史学体例撰成著作的是夏曾佑,1904年他著成《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开创性地依历史进化论思想,为中国历史划分阶段,将中国古代史分为“三大时期”、“七小时代”,以此表明历史的进化和发展,并采用篇、章、节的形式来记叙历史的演变递嬗。

总之,在清朝末年的浙江,传统的经学体系已被打破,近代科学学术体系开始建立。晚清浙江学术这一发展过程,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近代化的历程。由上文我们至少可以认为:中国近代学术之创立,主要是在西力东侵所形成的压力、西学东渐所提供的推力下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压力和推力作用下,中国学术加快跃进近代。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在西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前,传统学术已慢慢地向近代演进。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学术内容,还是学术方法,都为中国学术从传统进入近代作好了准备。中国近代学术正是在这两个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参考文献:

- [1]朱维铮(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 [2]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7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三八[A].上海师大图书馆编.清代碑传全集:下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徐世昌.清儒学案:第4册[Z].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90.
- [5]宋慈抱.义乌朱一新传[J].浙江通志馆馆刊,1945(民国34年),创刊号:81.
- [6]沈.与孙愈愚[A].落帆楼文集:卷八[Z].吴兴丛书本.

-
- [7]章炳麟. 黄先生传[A]. 章氏国学讲会(编). 太炎文录初编:卷二[Z]. 杭州:浙江图书馆刊本, 1919(民国 8 年).
- [8]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四十一[Z].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9.
- [9]张宪文(辑). 孙诒让遗文辑存[Z].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 [10]徐世昌. 清儒学案:第 3 册[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90.
- [11]支伟成.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M]. 长沙:岳麓书社, 1998.
- [12]闵尔昌(编). 碑传集补:卷四二[A]. 上海师大图书馆(编). 清代碑传全集:下册[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3]浙江通志馆. 重修浙江通志稿·“考选”统计:卷一一[M]. 杭州:浙江图书馆影印本, 1982.
- [14]姚淦铭(编). 王国维文集:第 3 卷[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 [15]汤志钧(编).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16]独角(章炳麟). 论经的大义[J]. 教育今语杂志, 1910(宣统二年), (2).
- [17]姚淦铭(编). 王国维文集:第 4 卷[Z].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 [18]章炳麟. 再与人论国粹书[J]. 国粹学报, 1907, (12).
- [19]姚淦铭(编). 王国维文集:第 1 卷[Z].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 [20]陈德溥. 陈黻宸集:上册[Z]. 北京:中华书局, 1995.
- [21]章炳麟. 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书[M]. 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